

文章编号: 1671—1653(2003)01—0033—04

# 虚构叙事的可靠性

——对《许三观卖血记》叙事的修辞性解读

阎立飞<sup>1</sup>, 徐宝锋<sup>2</sup>

(1. 天津社会科学院, 天津 300191; 2.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18)

**摘要:** 本文运用叙事修辞学理论, 对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进行了文本细读。从作者与作品人物的声音距离的变化中, 发现了作者的隐退及其情感的转变, 并探索到其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性因素。对小说历史叙事的分析, 不仅发现其构成了虚构故事的现实性依据, 进一步则透过意识形态的屏障, 深入到故事的“潜文本”。声音的距离与历史叙事共同为虚构叙事的可靠性提供了方法与意义的保证。

**关键词:** 虚构叙事; 声音的距离; 许三观; 历史叙事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 The Reliability of Fictitious Narration

——Analysis of Narrative Rhetoric *the Story of Xu San-guan Selling His Blood*

YAN Li-fei<sup>1</sup>, XU Bao-feng<sup>2</sup>

(1.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300191, China;

2.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050018,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tries to analyze the novel of Yu-hua, *the Story of Xu San-guan Selling His Blood*, using rhetorical theory of narration. In the change of the distance of voice between the author's and the character's, it is found that the author hides himself from the text and changes his feelings to the character, which is the motive force of the story.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of the st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has become the basis of the fiction, and it is further searched the undertext of the story through the ideology. Both the distance of voice and the historical narration give the guarantee of fictitious narration of methods and meanings.

**Key words:** fictitious narration; distance of voice; Xu San-guan; historical narration

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完成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作者认为这部小说实现了他“叙述中的理想”。本文运用修辞叙事学的方法, 对该小说进行了解读, 目的在于一方面探求故事深层的意义, 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虚构叙事的可靠性。

### 一、声音的距离

我们首先从声音这一概念开始。声音是叙事理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批评概念。詹姆斯·费伦认为, “声音既是一种社会现象, 也是一种个体现象, ”“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而且, “作者声音的存在不必由他或她的直接陈述来标识, 而

\* 收稿日期: 2002—12—27

作者简介: 阎立飞(1973—), 男, 河北平乡人,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可以在叙述者的语言中通过某种手法——或通过行为结构等非语言线索——表示出来,以传达作者与叙述者之间价值观或判断上的差异。”<sup>[1]</sup>在《许三观卖血记》这部作品中,我们会听到两种不同声音:一种是作者余华的声音。它隐藏在文本后面,或凸现在作品之中,体现着作为作者的存在及其价值、判断和经验,努力左右故事的进程和人物性格的发展;一种是作为主要人物的许三观的声音。它以自身的存在为依据,体现的是自我的经验和逻辑。这两种声音之间的距离因其价值观念的相同或背离而缩小或加大,对这种距离的分析和判断,一方面使我们深入到作品的内部,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和悖论,同时也是我们对叙事的修辞性解读的起点。

小说中的许三观是以一种单纯的声音出现的。之所以用“单纯”一词来形容他,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许三观是一个没有多少自我意识的城里丝厂的送茧工,他没有父母,单身一人,靠本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从他的声音里,从他的视界和行为中,体现的是一种缺乏经验的简单与幼稚。他只知道自己所知道的,甚至比自己应该知道得更少,所以他的行动,并不是建立在自我判断的基础上,而是出于模仿或本能的需要。如当许三观看到年轻的女人桂花路过时,他才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应该有个女人了。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第一次跟随别人去卖血,表现出可笑的无知。他不明白别人带碗和西瓜是分别用来喝水和送礼的,问道:“你们挑着西瓜,你们口袋里还放着碗,你们卖完血以后,是不是还要到街上去卖西瓜?一、二、三、四……你们都只挑了六个西瓜,为什么不挑一二百斤的?你们的碗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让买西瓜的人往里面扔钱?你们为什么不带上粮食,你们中午吃什么……”。卖完血后到胜利饭店叫菜时,他模仿的神气拙劣,拍着桌子喊:“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温一温。”<sup>[2]</sup>得来的三十五元,使他的欲望变为明确的目的和行动,但这种转变,并没有改变其话语方式的幼稚,即便在追求女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智慧,也和他的单纯相一致,而没有增加他的自觉性。

其实,正是这种单纯的声音,把作者和许三观之间的距离拉开了。从许三观的简单与幼稚的声音中,体现了隐含作者余华的权威性,即作者正在

操纵着故事的进程,并赋予许三观特定的行为特征。这样,两种声音之间以反讽的形式确定了它们的张力关系,即作者用讥讽、嘲笑、戏谑的表情观看许三观的天真表演,而许三观仿佛丝毫没有觉察到其命运操纵者的存在,只是以无意识的行为展示自己。在上述的例子中,只要许三观一说话,我们就会感受到两种声音的存在,即“双重声音”。<sup>[3]</sup>这样,不但隐含的作者,同样作为现实的读者我们也一起聚焦于许三观的行动,共同享受因不同声音者之间的强烈反差而构成的一种木偶剧式的喜剧效果。米·巴赫金在论述拉伯雷小说中的民间节日形式和形象时提出“狂欢节化”,认为狂欢节“使意识摆脱了官方世界观的支配,使人们可以用新的方式观察世界;它没有恐惧,没有虔诚,它可以是彻底批判的,但又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展示世界的”。<sup>[4]</sup>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作者和现实读者的注视下的许三观的行为具有了“狂欢节化”的性质。他把经典的情感话题上面的温情面纱揭去,戏仿为赤裸裸的两性之间的物质交换和欲望追逐的游戏。如许三观对许玉兰说:“小笼包子两角四分,馄饨九分钱,话梅一角,糖果买了两次共计两角三分,西瓜半个有三斤四两花了一角七分,总共是八角三分钱……你什么时候嫁给我?”<sup>[5]</sup>他把产生悲剧结果的事件演化为喜剧性的家庭内部的争斗。如当他得知许玉兰曾有不忠行为且一乐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时,他的沮丧和气愤以及由此对许玉兰的惩罚在隐含作者的嘲讽性的注视下变得十分滑稽,他的行为最终沦为一场阿Q式的不成功的家庭闹剧。

许三观的卖血行为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从第四次卖血开始,我们注意到作者和许三观之间的距离发生了变化。作者讥讽、嘲弄的声音在减弱,同情的成分在逐渐增加,这就意味着二者之间的距离在缩小。接着,许三观卖血频率的增快,突出了他与环境之间的张力。声音由文本内在的戏谑性转向了外在的指涉性。这样,作者和许三观之间的价值观走向交汇的同时也意味着其现实成分的增强。通过分析这一修辞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断作者的叙事走向。许三观的第四次卖血是在献身精神的支配下的一种自觉行为,而此前或出于本能需求,或出于迫不得已,或者出于报复心理。作者首先借许三观的声音把现实背景做了简单的

描述,“今年是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还有什么?”“要吃饭去大食堂”。<sup>[6]</sup>

作者这样做本身意味着一种妥协,因为让许三观参与叙述进程是以放弃自己的叙事权力为代价的,等于承认了许三观的自主性。进一步说,突出许三观的声音表示着对许三观的认同,即认同许三观对这些事件的价值判断,所以,当许三观在用他的嘴为大家做菜以庆祝自己的生日时,作者没有表示丝毫的嘲讽,转而以一种肯定的态度对待这种“画饼充饥”式的行为,用赞赏的目光看待他卖血后夸张的表现。作者这种肯定的态度还表现在许三观以后的行动中,如他给遭批斗的妻子许玉兰送饭,在家庭批斗会中为许玉兰平反等。随着许三观的行动,我们一方面发现作者的隐退,他退居到文本的后面,以和声的形式包容在许三观的声音中。同时,获得自主性的许三观左右了叙事的方向,以自己的逻辑方式继续向现实挑战。对于作为现实读者的我们来说,虽然从许三观的行为中仍可以感受到快乐,但这种快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出于作者与许三观两种声音之间的反差,而是因许三观与环境的不协调所产生。作者和现实的读者不但都以肯定的态度注视着许三观的行动,而且同样也感受到环境的压力,我们的笑声因此也变得谨慎起来。

接着,许三观卖血的频率加快。为了招待二乐的生产队长,他卖了一次血;为了救治生重病的一乐,许三观一路卖血到上海,十五天中他连续卖血六次,差点把命卖掉。故事随着卖血节奏的加快而达到高潮。此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不再是以前那个神气活现的许三观,而是一位穿着厚重棉衣的可怜老者。他孤独地走在雪后的路上,大碗地喝着冰冷刺骨的河水,身体抖成一团,并因感到委屈而泪流满面。他打算多卖几次血,并想尽办法,同时他又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后果,和他第一次卖血的阿方已经把身体败掉了,根龙因卖血而丧了命,他对来喜兄弟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想,我觉得这身上的血就是一棵摇钱树,没钱了,缺钱了,摇一摇,钱就来了。其实不是这样,……你们往后不要常去卖血,卖一次要歇上三个月,除非急着用钱,才能多卖几次,连着卖血,身体就会败掉。”<sup>[7]</sup>这不是一般的告诫,而是许三观对自我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是一种个性化的声

音,它标志着许三观彻底地突破作者的限制,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进一步说,这一告诫又强化了许三观的意愿与行动的矛盾,它不但赢得了读者的同情,也赢得了作者的赞赏,后者不得不完全放弃手中的权力,以赞同的声音跟随在许三观的后面,任凭他疯狂地卖血。

## 二、虚构故事中的历史叙事

对声音的考察,使我们看到距离的产生及其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在感受阅读所带来的愉悦的同时,常常忍受着这样的疑问,即许三观卖血的意义何在?余华对许三观卖血行为的反复细致地刻画仅仅是出于纯粹的虚构的需要?事实上,余华在虚构故事的同时,也为故事寻找历史依据,为建构叙事的现实性而努力。如他在“代后记”中这样写道“在我已经胸有成竹的叙述上面,我如何写出我越来越热爱的活生生来?”<sup>[8]</sup>这个“活生生”就是故事中的历史叙事。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历史叙事,不同于传统历史小说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再现,也不同于革命历史小说对革命家史式的追溯和言说,这两类小说虽说也有虚构,但主要脱胎于原有的历史事件或对历史事件的仿写,更看重其“史实”的意识形态功效,所谓的“历史框架”和“正言”就是它们的特点。《许三观卖血记》完全脱离了以上的限制,它首先是一篇虚构故事,其中的人物和情节过程,并没有现实的原型,纯粹出于作家的构想。而所谓历史叙事,是指透过虚构故事并为其时空背景提供历史依据的那一部分,它以其开放的疆域为虚构故事提供言说的舞台。因此,虚构作为主导叙事一方面受制于历史的表述,同时也以其个性化的话语对历史进行重新注解或解构。但这种行为不是随意的,因为它力图接近真实的历史现实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顺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我们看到,小说中明确提到的背景事件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和“知青下乡”等,从时间段上,它们构成了当代史中除“新时期”以外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余华首先是以民间视角来解读这段历史,审视这些事件对民间生活造成的影响。如“大跃进”后,许三观一家用喝稀粥的方法度灾荒年,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以一种朴素的眼光把这两个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对所

谓的“自然灾害”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而一向大肆收受礼品的医院李血头入党后却拒收许三观的白糖,表示“我现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了”,但在灾荒年中他又主动伸手向卖血的许三观索要,“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了,遇上这灾荒年,我要是再不收点吃的,不收点喝的,这城里有名的李血头就饿死啦,等日子好过起来,我还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sup>[9]</sup> 饥荒不但迫使许三观忍饥去卖血,有意思的是,它还改变了人们的政治操守和道德价值观(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恢复原有的本性),具有一定的荒诞性。而更为荒唐的事发生在许玉兰的身上。以往对“文革”中批斗行为的描写,往往集中在“地、富、反、坏、右、特”等几类人身上,究其原因主要是出于他们的政治观点的不同和出身上的复杂。而对许玉兰来说,她既没有出身问题,又不存在政治上的错误,只是出嫁前有过“生活问题”就被打成“妓女”,她被剃了个“阴阳头”,陪斗、站街、参加家庭批斗会等。于是,余华的虚构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这样的“文革”画面,它不再是阶级和路线的争斗,而是演变为一场浩大的全民性的“政治狂欢节”。它颠覆了社会,颠覆了秩序,也颠覆了正常的人性,以挤压个体活动空间的方式影响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使日常生活戏剧化。从这方面说,余华的反思比前人进了一步。

但是,我们也看到,余华对历史的反思并没有突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限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历史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于文本的,在文本之内,意识形态被独尊为决定自己的想象性历史或‘伪’历史的支配结构。”<sup>[10]</sup> 对于“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灾荒”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想象中是这样的:它们虽然没有阻断历史前进的脚步,但是作为发展过程中一个曲折阶段,或视为政策失误而加以批判或被认定为“动乱”而予以全盘否定。余华的虚构叙事就是在这一“支配结构”下进行的,所以虚构叙事对其无论怎样揭露、嘲笑、讥讽,无论展示何种的荒唐,都不会逾越意识形态所限定的话语权限,反而有利于强化其意识形态效果。虚构叙事中的历史叙事因此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属于“共谋”的关系。

余华对许三观的卖血行为做了反复的叙述,作为一个关键词,我们在认识这一叙事功能的重

要性的同时应注意发掘其中的深层意蕴。从修辞叙事学的观点来看,“反复”这一修辞行为的本身就是我们解读的视点。“‘修辞’的形式——尤其是具体的‘修辞格’本身——可能带有意识形态的内涵。这不仅只是说,修辞可以传达意识形态(如政治家用修辞手段增强其政见的传播与说服力),而是说修辞的形式本身也会含蕴价值观念。”<sup>[11]</sup> 小说中,许三观前后卖血十二次,作者采用反复的修辞手法首先向我们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三观的卖血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件存在着普遍性的问题。我们由此会联想到在当前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些地区由于旺盛的卖血而引发的大规模恶性传染疾病的流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恐慌问题。这两者之间或许出于巧合,或许是作者的虚构叙事无意识中切中了现实的命脉。但这种巧合正恰恰说明了小说与现实的同构性。“发生学结构主义”批评家吕西安·戈德曼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真正重要的作品与社会群体——通过创造者的媒介而成为最后一根稻草的真正创造主体——之间的关系,与构成作品的各种因素和作品整体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我们所遇到的都是一个综合结构的各个因素与这个结构总体之间的关系,它既是一种综合的又是一种解释的关系。”<sup>[12]</sup> 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但可以解释小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且从二者的对比中做出一些判断。如我们对二者之间的感情倾向问题,当我们以同情或怜悯的态度打量着许三观的卖血行为时,却以一种批评的眼光看待现实中的“许三观们”,批评他们的愚昧和无知,习惯于对他们的排斥和忽略。这种对比本身表明了一种现实态度,即社会的态度。对此,应该反思我们的态度是不是过于冷漠,我们对于身边的事情是不是过于疏忽。

“反复”这一修辞还使我们发现《许三观卖血记》的“潜文本”,即表层文本下的深层结构。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通过对“吃人”的反复修辞,借“狂人”的口说出其文本的深层内涵,即每页上都写有“仁义道德”的封建历史,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是写着两个字是‘吃人’”,<sup>[13]</sup> 整个封建历史就是一部“吃人”史。“反复”这个修辞格在表达“吃人”史的过程中也被赋予其特定的价值内涵,即循环史论。

(下转第53页)

故(犯罪、恐怖分子等)的发生。

7. 闯红灯违章监测系统。利用照相、摄像、视频检测手段,记录闯红灯车辆所在路口、车辆号码、发生时间等信息。我国的主要城市基本都实现了闯红灯自动监测。

8. 交通事故快速勘察系统。利用立体摄影、计算机技术及信息通讯技术,对事故现场进行快速勘察、制图和事故现场图像的及时传送,使指挥控制中心对交通事故进行实时处理和指挥。

9. 电子收费系统(ETC)。利用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信息通讯技术,通过安装在汽车上的电子标识卡(存贮与车辆收费有关的大量信息,如预缴金额、车型、车主等)与安装在收费车道旁的读写收发器,通过微波或红外进行快速的数据交换,实现车辆的不停车收费。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和公路收费站正在试行ETC技术,如四川宜宾

正进行全面的ETC示范工程。

智能交通运输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投资巨大。我们在选择和制定智能交通系统发展策略时,要结合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从实际出发,选择那些符合我国国情又具有投资少,见效快,对改善城市交通运行质量有明显作用的项目作为我国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的优先领域。例如,优先发展城市智能公共交通系统;在城市的主要干道上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增强干线的通行能力等。与此同时,培养我国发展智能交通运输系统的人才,加快智能交通系统专业人才的知识更新,改革交通运输相关专业的教育,拓宽知识面,增加信息、通讯、控制和系统工程等教学内容,适应交通运输现代化的要求,才是发展我国智能交通系统的长远之策。

#### 参考文献:

[1] 赵恩荣. 智能交通道路系统(ITS)的效益[J]. 公路运输, 1999, (10).

[2] 关振柔. 智能交通系统的兴起及发展前瞻[J]. 电讯技术, 1999, (2).

(上接第36页)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在许三观的卖血史中以隐喻的方式对当代历史给予了命名,为自己的虚构叙事建构了现实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反复”这一修辞格一方面为抵达命名起到桥梁作用,同时它还承续了循环史论的价值观,对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的发展史观给予了否定,因此它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一种意义相反的离心力。这就形成一个有趣的悖论:余华在表层文本中有意识地顺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在“潜文本”中却无意识地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进行

了颠覆。这一发现,不仅为解读文本提供了理论途径,而且也要求读者不断参与故事的进程。

总之,对《许三观卖血记》叙事的修辞性解读,使我们看到声音的叙事学效果,它不但推动故事的发展,而且也要求我们在聆听时对故事的参与,并深入到意义的层面。而对小说的历史叙事的探索,则使我们的目光透过意识形态的壁障,触及到故事的“潜文本”。它们共同为虚构叙事的可靠性提供了方法和意义的保证。

#### 参考文献:

[1] [3] (美)詹姆斯·费伦. 陈永国,译. 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9—21, 170.

[2] [5]—[9] 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M].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7, 15, 24, 105—106, 237, 255, 75, 122.

[4] (俄)M·巴赫金. 佟景韩,译. 弗朗西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M]. 巴赫金文论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48.

[10] 特里·伊格尔顿. 批评与意识形态[M]. 转引自(英)拉曼·塞

尔登编. 刘象愚,等,译. 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06.

[11] 高辛勇. 修辞学与文学阅读[M].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3.

[12] 吕西安·戈德曼. 文学中的发生结构主义[M]. 小说社会学. 转引自(英)拉曼·塞尔登编. 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 469.

[13] 鲁迅. 狂人日记[M]. 鲁迅选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12.